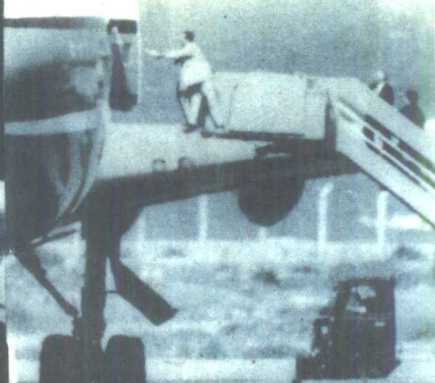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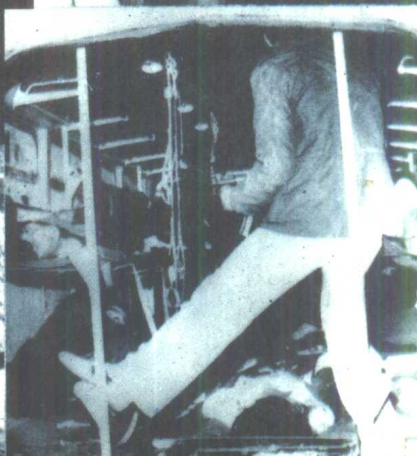


紀實奇觀叢書



國際大綁架

係傑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国际大绑架

孙杰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 新登字05号

国际大绑架 GUOJIDABANGJIA

孙杰 著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鄂俊大

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125印张 2插页

185 000字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7 000册

定价：5.00元

目 录

第一章	绑架，政治恐怖活动的杀手锏·····	1
第二章	绑架，跨国界行动·····	31
第三章	贝鲁特，绑架“无底洞”·····	55
第四章	女人和儿童：绑架者理想的“猎物”·····	92
第五章	绑架，悬在富翁头上的绞索·····	129
第六章	自由或死亡，被绑架者无权选择·····	158
第七章	反绑架，血的代价·····	195
第八章	反绑架，成功的范例·····	223
尾 声	斩断绑架者的黑手·····	250

第一章 绑架，政治恐怖 活动的杀手锏

绑架缘何受“青睐”。一份令人胆
颤的绑架表。总统也是绑架者的
“猎物”。“混世魔王”的拿手好戏。

在当代恐怖分子所习惯采用的劫机、绑架、暗杀、爆炸、袭击五种主要活动手段中，绑架是一种颇受青睐且日益成为一种成功率比较高的政治恐怖活动战术。

对七十年代间全世界发生的近7000起国际恐怖活动归类分析表明，绑架案件占了8%以上。据统计，在1985年发生的408起国际恐怖活动中，有125人被绑架，1045人被作为人质扣押过。美国国务院关于1987年国际恐怖活动的年度报告说，全世界在当年发生的774起恐怖事件中，绑架案有52起，占6.7%。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分类，因为恐怖分子在实施其他恐怖手段中，也往往包含有绑架人质的过程。如劫机，在严格意义上其实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绑架。尽管表面看来，绑架在政治恐怖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但每一桩绑架案都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效应。

恐怖分子之所以乐于采用绑架的手段，一般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一，对于一些资金匮乏的小政治恐怖组织来说，为了使世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和要求，绑架活动是一种费用较低的策略。他们绑架人质虽主要基于政治目的，但也同时附有苛刻的经济要求。据统计，在七十年代全球发生的绑架案中，恐怖分子提出的赎金总额为4.5亿美元，实际支付了1.6亿美元。1977年9月，西德“红军派”绑架雇主协会主席施莱尔后，除了要求释放身陷囹圄的八名同伙外，还索要1500万美元的赎金。这些巨额赎金无疑成为一些恐怖集团维持其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

二，一些国家拥有的军队和其他形式的常规力量对绑架者实际上无能为力。由于恐怖分子多以地下的秘密形式活动，常能出其不意取得成功。1978年3月16日，意大利“红色旅”绑架前总理莫罗后，意大利警方曾先后出动五万余名军警营救，还邀请了英国的反恐怖专家予以协助，但不仅没有救出莫罗，而且连一名真正与此案有关的人也没有抓到。甚至最后连莫罗的尸体也是在对方的示意下才找到的。

三，人们的安全意识加强后，袭击大使馆和政府官员以及劫机等恐怖活动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绑架于是成为恐怖分子取得手中王牌——人质的主要途径。

四，与其他恐怖活动手段相比，绑架是一种比较“柔和”的手段。绑架者一般都不以杀害人质为绑架的目的，而是把他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绑架者一方面可以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在迫不得已时释放人质了事，保护自己不被追究，另一方面限制与政府激烈的军事对抗。因为为了保障人质的生命安全，军警在进攻绑架者时不得不有所节制。贝鲁特的绑架者大量绑架西方人质，就是为了迫使西方国家改变其中东政策。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绑架的人质成为有关国家的一块“心病”。

五，可供恐怖组织绑架的目标几乎是无限的，而这些目标不可能全部受到严密的保护。据一般的规律，恐怖分子若绑架的是国内目标，则对方必定是身居要职或影响较大的人物，而对国外目标，被绑架者的范围则大得多。因为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外国公民，也会引起两国间的密切关注，进而形成国际影响。这就是贝鲁特的绑架者不仅把西方外交官员，而且也把一般的西方公民视为“猎物”的原因。

绑架活动虽古已有之，但泛滥成为主要政治恐怖活动，则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六十年代末期，南美一些民族民主主义者提出了一套脱离群众，以恐怖手段打击现政权的“城市游击中心主义”。被称为当代恐怖主义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巴西人卡洛斯·马里格拉，就系统阐述了一整套恐怖战术，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绑架。他在《城市游击战手册》中指出：“绑架和扣押警察、北美间谍、政界人物或危害革命的臭名昭著的敌人，绑架那些没有发表过任何政治观点的从事文艺、体育和其他各项活动的知名人士，也可能会提供有利于革命者的宣传。”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各种绑架组织在1968年以后陆续出现，他们进行了拉美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政治绑架活动——绑架大企业头目以获取赎金作活动经费；绑架政府要员以换取被囚同伙；绑架外国使节以扩大政治影响。

据统计，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中南美洲共有1000名以上的商人横遭绑架。绑架外交官的活动也是风起云涌。

1969年9月4日，驻巴西的一位外交官在里约热内卢街头被四名武装分子绑架。他们提出的条件是立即释放被巴西政府

关押的15名政治犯。翌日，巴西政府迫于外交使团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让步。

1970年3月，西德驻危地马拉大使被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绑架，五天后发现他的尸体。

1970年6月，西德驻巴西大使也被绑架。绑架者系巴西人。在巴西政府答应其条件，释放了四十名在押政治犯后，大使获释。在此前后，日本、瑞士驻巴西的外交官也遭到过绑架。

乌拉圭的城市游击队组织“民族解放运动”于1970年绑架了很多在乌拉圭工作的外国人之后，在1971年1月8日又绑架了英国驻乌拉圭大使。

西方驻拉美国家外交官连遭绑架事件引起西方国家和拉美国家政府的不安，并导致有关国家双边关系的紧张。1970年7月，美洲国家组织在华盛顿举行外长会议，通过了谴责恐怖和绑架活动的决议。

但这并没有制止愈演愈烈的绑架活动。从此，绑架者把绳索投向了大使馆，外交官变成了既令人艳羡，却又充满危险的职业。

1973年9月5日，五名恐怖分子占领沙特阿拉伯驻法国大使馆，绑架了11名人质。恐怖分子被捕后被送往科威特，随后去利比亚。

1974年9月13日，三名恐怖分子占领了法国在荷兰的大使馆，绑架了包括大使在内的8名外交官。在法国政府答应释放被其关押的一名日本人后，恐怖分子去了伊拉克。

1975年4月24日，一批西德的恐怖分子占领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西德大使馆，绑架了数十名人质。恐怖分子要求释放26名被押的西德政治犯。最后，恐怖分子均遭拘捕，枪战中有

三人死亡。

1975年8月4日，日本“赤军”成员占领驻马来西亚的美国领事馆，绑架了52名人质。他们要求日本政府释放在押的7名同伙。日本政府被迫接受这一条件。在此前后，该组织还进行了一系列袭击使馆、绑架人质活动。

1975年9月15日，四名恐怖分子占领埃及驻马德里大使馆，绑架了6名外交官。他们要求埃及立即退出日内瓦谈判，威胁埃及政府若不抨击与以色列签订的临时协定，便处死人质。

.....

1978年7月31日，几名恐怖分子占领伊拉克驻法国大使馆，一名伊拉克外交官和一名法国警察被绑架后遭枪杀。

1979年2月14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塔布斯在从官邸赴使馆途中，被四名恐怖分子绑架到喀布尔市中心的一家旅馆，并在那里被害。

1979年5月，土耳其警方破获一起企图绑架美国和以色列领事的阴谋。两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两名被捕。

1984年7月9日，利比亚驻贝鲁特人民办事处（大使馆）秘书长费图里遭武装分子绑架。

自1983年贝鲁特掀起的绑架恶潮后，不仅美、英、法和西德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外交官频遭绑架，其他西方小国的“友好使者”们也难逃厄运。如：1985年1月3日，瑞士驻黎巴嫩大使馆代办韦尔利被五名不明身份的持枪者绑架。再如：1986年1月18日，西班牙驻贝鲁特的3名外交人员也被绑架。绑架者要求西班牙释放被关押的两名什叶派分子。

.....

当然，绑架者的目标远不止这些外交官。从政界显要、巨贾富翁到妇女儿童、平民百姓也都是他们的“猎物”。除了我

们将在下面详细介绍的案件外，世界上近二十年间发生的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绑架案还有——

※1973年9月28日，恐怖分子在奥地利占领了一列从苏联运载犹太人出国的列车，三名苏联移民遭到绑架。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恐怖分子要求奥地利关闭谢纳瓦市的苏联移民中转站。最后，恐怖分子被允许搭乘飞机前往利比亚。

※1974年5月15日，三名武装分子袭击了以色列的一所小学校，绑架了90名小学生为人质，在与以色列军警交火中，包括绑架者在内，共有21人死亡。

※1976年9月26日，三名恐怖分子袭击大马士革的沙米尔·阿米斯旅馆，绑架90名人质，杀害4人，34人受伤。恐怖分子要求叙利亚当局释放其同伙。在交火中，恐怖分子头目被击毙，其余2人被生擒。

※1976年11月17日，四名恐怖分子袭击了约旦首都安曼的一家旅馆，绑架一批人质，两名职员遇害，三名旅客受伤。约旦警方在与恐怖分子交火中，有两名士兵死亡，一人负伤。三名恐怖分子被当场击毙，一名被俘。

※1977年3月9日，美国“哈纳菲穆斯林”12名黑人激进分子占领华盛顿市政厅，将绑架的132名人质扣留在三座建筑物内。两天后，该组织释放人质并向警方投降。在围攻战斗中，一名人质死亡，十几人受伤。该组织首领及其两名追随者被宣判犯有二级谋杀罪，八条绑架罪；另九名恐怖分子也被判有绑架罪。

※1977年5月23日，南马鲁古恐怖分子在荷兰劫持一列火车，以后又占领一座小学校，绑架了166名平民和儿童为人质，要求让他们所在的岛屿脱离印度尼西亚独立。

※1986年11月15日，莱索托前外交大臣和新闻大臣西克西

谢等五人在莱索托大学被身份不明的人绑架后遭杀害。

※1988年5月29日，哥伦比亚恐怖组织“4·19运动”在首都波哥大一座教堂附近绑架了哥伦比亚第二大政党社会保守党领导人、前总统候选人、《世纪报》社长戈麦斯。哥伦比亚一些政党代表为营救戈麦斯，在巴拿马境内与“4·19运动”代表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7月20日，被囚禁53天的戈麦斯重获自由。

.....

在所有遭绑架的人质中，地位最高的当属两位在任总统。

1984年6月30日清晨，几声凌乱的枪声把玻利维亚总统西莱斯从熟睡中惊醒。当他睁开眼时，发现一大群已经闯入卧室的武装分子，正用十几杆枪对着他。随后，西莱斯被押上一辆停在总统官邸外的吉普车，带往拉巴斯郊区。这起绑架案是一批反政府军官和贩毒集团勾结起来干的。事发后，玻利维亚总工会宣布举行无限期总罢工以示抗议，武装部队首脑也宣布忠于政府，并下令全国军队进入戒备状态。与此同时，拉美各国政府也纷纷谴责对西莱斯的绑架。迫于内外压力，绑架者在得到保证人身安全和可以到外国使馆避难的许诺后，把被他们扣押了十个小时的总统释放。

另一位遭过劫难的总统是厄瓜多尔的科尔德罗。1987年1月16日上午，一群士兵绑架了这位总统。在与总统卫队的枪战中，哗变士兵打死了四名总统保镖，打伤了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七个人。后来，厄瓜多尔政府被迫让步，答应绑架者提出的条件，释放在押的前空军司令巴尔加斯来交换总统。科尔德罗还签署了一项法令，保证不追究绑架者的责任。这样，科尔德罗才又重新坐回他的总统宝座上。

在政治绑架案中，会经常发生一种被专家们称为“斯德哥尔摩现象”的事。不过，这种现象却是源于一桩普通的刑事

案。

1933年8月，一名绑匪在单枪匹马持枪抢劫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时，中了警方埋伏。于是，他绑架了三女一男共四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保险库里。他向警方提出的条件是，保证他安全离开斯德哥尔摩，并释放一名在押同伙。否则，他将杀害人质。在对银行包围了六天之后，警方借助银行大楼的建筑图，凿穿了保险库，用催泪弹将绑匪和人质驱赶出来。但出了保险库之后，有三名人质反而将绑匪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其中一名女人质还说她爱上了绑匪，等他获释后定要嫁给他！

其实，这种现象在政治绑架案中早已有之。1974年2月4日，美国旧金山《观察家报》发行人鲁道夫·赫斯特的女儿、十九岁的帕特里夏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其寓所遭绑架。绑架者是形成于六十年代末的美国极左派恐怖组织共济解放军。该组织提出赫斯特要用两亿三千万美元的食品分给穷人作为赎金。结果，赫斯特被迫在奥克兰分发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食品。然而，帕特里夏不仅不肯获释回家，反而在4月正式加入了该组织！从此，这位金发碧眼的富家女子也干起了抢劫银行等“营生”。1975年9月，联邦调查局和旧金山警方逮捕了她，并判处她缓刑五年。1979年1月，美国总统卡特宣布减轻其刑罚。

更有甚者，当恐怖分子在同军警交火时，被其绑架的人质却主动帮助他填装子弹；还有的恐怖分子在逃命时嫌带着人质累赘，想将对方释放，对方不仅不依，反而紧跟绑架者身后，用石头向追赶的警察投掷，以保护绑架者逃生……

这些现象虽近乎荒唐，但其中蕴藏的深刻内涵，却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

二十年来，活动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十几个主要恐怖

组织，极左的如意大利的“红色旅”、西德的“红军派”、法国的“直接行动”、希腊的“11月17日”、秘鲁的“光辉道路”、日本的“赤军”，极右的如美国的“三K党”、意大利的“黑手党”，民族主义和宗教性的如巴勒斯坦的“阿布·尼达尔组织”、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的“埃塔”、黎巴嫩的“伊斯兰圣战组织”、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之虎”等等，等等，都无一例外地从事过绑架活动。但其中以绑架活动“著名”的，则主要是“红军派”、“赤军”、“埃塔”和“红色旅”、“伊斯兰圣战组织”。（这两个组织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讲述）

1977年9月5日傍晚，西德雇主协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驱车驰向科隆市拉施多夫大街他的私人住宅。突然，司机发现前方道路中间横着一辆黄色的梅塞德斯大轿车，他急忙转动方向盘，想从那辆车的旁边驶过。就在这时，一位推婴儿车的妇女却猛然把手中的车掀倒，将道路完全堵死。施莱尔的司机只好紧急刹车。这时，五名手持冲锋枪的恐怖分子从道边停放着的两辆轿车中冲出，对着施莱尔的汽车就是一阵猛扫。施莱尔的司机和随行的三名警官还未反应过来便中弹殒命。两名红军派成员将施莱尔从车中拖出来，推进一辆白色大众牌面包车，随即消失在夜色中。全部绑架过程只用了一分半钟。

红军派把施莱尔扣为人质，要求当局释放在押的11名同伙。西德政府不予理睬，出动大批军警四处搜查，“捉迷藏”般地同绑架者周旋了43天。最后，红军派见自己的目的难以达到，便残忍地将施莱尔杀害。

10月19日晚上，警方在一辆停放在莱茵河边的法国米卢兹牌轿车的行李箱中，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62岁的施莱尔是被

人用绳子勒死的，留在他尸体旁的一份传单写着：“我们结束了施莱尔悲惨、腐朽的生命”，“但斗争只是开始”，“我们要通过武装的反帝斗争来获得自由”。落款是：红军派。

此后不久，红军派成员还在阿姆斯特丹绑架了一名富翁，并提出要荷兰女王退位的可笑条件。其实，他们不过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政治要求来掩饰其卑鄙龌龊的金钱欲望。他们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想敲诈几个钱而已。当一大笔巨额钞票流进他们腰包时，富翁自然买回了一条生路。此外，红军派还曾在1975年绑架过西柏林基督教民主党主席罗连兹。

绑架也是西班牙民族分离主义恐怖组织“埃塔”的拿手好戏。这个组织的第一次绑架行动发生于1970年。起初，绑架的目的是为了索取金钱来筹集活动经费，所以大部分被绑架者都在交纳赎金后获释。1976年，西格马公司总经理安赫尔·巴拉萨迪因未交纳约合150万美元的赎金而被杀害，成为第一个丧生的被绑架者。后来“埃塔”又把绑架目标转向政界和外交界，第一个受害者是西德驻西班牙领事欧根尼·贝勒。1983年10月4日，“埃塔”绑架了马丁·巴里奥斯上尉，这是他们第一次绑架军人。恐怖分子释放上尉的条件为：政府立即释放在押的九名同党。西班牙政府把这一要求称为“讹诈”，断然加以拒绝。恐怖分子于是果真将马丁上尉处死。这次绑架案促使西班牙议会通过了新的《反恐怖活动法令》。

但恐怖分子从来都不把国家的法令放在眼里。为反对西班牙政府在毕尔巴鄂城建设核电站，“埃塔”组织于1981年1月29日——该电站即将完工之际，绑架了核电站39岁的工程师何塞·里安。由于政府拒绝了拆除核电站的要求，恐怖分子便残忍地杀害了这名无辜的工程师。这一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愤怒。2月9日，成千上万的巴斯克人冒着阴雨和寒风走上街头，举行

反恐怖活动示威。三个巴斯克省份的工人还举行罢工以示抗议。恐怖分子绑架行径之不得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这些组织所从事的绑架活动，与红色旅相比，还只能算是“小把戏”……

震惊世界的绑架大案之一：红色旅绑架意大利前总理。意政府拒绝恐怖分子的交换条件。莫罗曝尸街头。

意大利米兰一所简易公寓里，三男二女围坐在餐桌前，悠闲地聊着天儿。

五位青年的衣着简朴而整洁。一看便知，他们是典型的七十年代初意大利贫寒的大学生。屋内也没有多少陈设，书刊、花盆、草垫、窗帘都收拾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主人想必是一位生活十分严谨的人。

看得出，五个人的内心都很激动，但他们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装出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语调平静、和缓地表述着自己的意见。特别是那两位女青年，还不时地忽闪着漂亮的大眼睛，“咯咯”地笑上一阵，似乎谈到了很开心的事。

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在闲聊。他们谈话的主题一点也不轻松，甚至与这里的气氛格格不入。他们正在讨论的是——绑架。

这些人便是赫赫有名的意大利极左派恐怖组织“红色旅”的领导人。他们是：阿卢尼、加里纳利、博尼索利和芭尔芭拉及安娜。

没人记得这是第几次开类似内容的会了。

自从1976年他们的领袖雷纳托·库乔第二次被捕以后，他们便开始不停地研究对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位他们所尊敬的领导人救出。但是，警方对库乔等红色旅成员的看守实在是太严密了，他们甚至无法搞清库乔确切的关押地点！虽然他们已经想方设法，十几次有效地制止了法庭对库乔等红色旅成员的审判，却始终没机会把他们的领袖救出囹圄。

“我强调，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红色旅临时负责人阿卢尼严肃地说道，“各位执委们，今天是1978年3月2日，半个月之后，那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们就要审判我们的库乔同志了。主审的巴巴诺法官在报纸上扬言，不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审判仍要继续下去。我们绝没有理由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我们能不能考虑劫法庭？”芭尔芭拉小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恐怕不可能。这次审判的法庭设在宪兵营中，他们还调集了4000名军警戒备，据说还有十几辆装甲车和坦克守卫，都灵市那天恐怕还要实施戒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博尼索利表示反对。

红色旅另一位临时领导人加里纳利说：“我倒是觉得罗马行动组的意见值得考虑。他们想在开庭前绑架一个政界要人，先阻止对我们同志的审判，然后再用人质换回我们的同志，至少要把库乔同志救出来。安娜同志指导了罗马组的这次计划，让她来详细讲一下。”

安娜羞涩地眨了眨眼，声调悦耳地说：“我觉得在目前意大利政坛上，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只有天民党几位头面人物：范范尼、莫罗和安德烈奥蒂。我让罗马组的同志对这三个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范范尼和安德烈奥蒂的住宅都在罗马市区，戒

备森严，很难下手。他们俩的行踪也没有规律，绑架他们比较困难。我们最理想的目标是莫罗。他住在郊区，每天上班前都要去圣基亚拉教堂做祈祷，行踪十分有规律，几乎天天经过马里奥法尼街。其次，他自恃颇得民心，所以几乎没有严格的警卫措施。最重要的是，莫罗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核心人物，绑架他，威慑力最大。现在罗马行动组已有11名成员，我想力量是足够了。”

红色旅的头目们经过一阵认真的研究，最后同意了安娜的计划。他们还任命安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立即赴罗马进行部署。

阿卢尼坚定地说：“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几天大家行动一定要小心，不能出一点纰漏。我再重申一遍，所有成员必须按时付房租、电费和煤气费，行动要避开房东；夜间不许开收音机；不要在报摊和酒吧附近找住所；房间里要准备充分的粮食和急救药品；文件要收好。这些小事切不可疏忽。”

然后，他又充满爱意地摩挲着安娜的头发说：“库乔同志的安危系于你一身，一定要谨慎啊！我们只有成功一条路可走。”

“阿卢尼同志，别操心了。安娜比你更关心库乔的。”芭尔芭拉说完，“咯咯”地笑了。

安娜“腾”地一下红了脸。

阿卢尼觉得有些尴尬。他见天色已黑，便宣布散会。

从此，在罗马的马里奥法尼大街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窈窕少女的身影。尽管她每天都换一身新的装束，但这却掩盖不住她那令人难忘的美丽面容。她每天一早都要在大街上游荡一阵，以致于人们怀疑她是个妓女！

这个女子就是安娜。